

树立和发扬 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

西南政法学院语文教研室编写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资料组印

一九七八年六月

说 明

西南政法学院语文教研室编写了一份《树立和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教材，现正征求意见。特印发给三部学员学习“科学态度与革命文风”时参阅。

文史教研室

一九七八年六月

树立和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

前 言

文章是宣传舆论的重要工具。一个阶级，一个政党要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宣传自己的路线和政策，都要写文章。由于不同的阶级和政党对文章有不同的写法，因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风。什么是文风呢？如果就词释义，简单说来，文风就是文章的风格和特点，但这样的解释并没有揭示出文风的本质属性和它的丰富内容。毛主席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整顿党的作风》）可见文风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对一个阶级和政党来说，文风是它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反映，而阶级和政党的文风又总是通过具体的人的具体文风体现的，所以对作者来说，文风就是一个人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的体现。但这并不是说立场观点一致的人写出来的文章只能是一种风格，由于人们的知识范围、理解能力、生活经历、表述方法不一样，每个人写文章的特点也各不相同，不过从总的来看，个人文章的风格都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和政党的文风的。在符合马列主义文风的前提下，我们要提倡多种多样的风格和笔调。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是阶级和政党的文风。

文风是一个阶级、政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列主义文风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文风是根本对立的；但这

并不排斥我们对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些文章，由于作者个人的经历、遭遇不同和所处的具体环境中某些特定的原因，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在语言的运用和写作的技巧上也有独到之处，这些是值得我们在批判的基础上学习和借鉴的。

古代文人也常论及文风。他们把文风称为文章的风骨、格调，喜欢用什么“清奇”“飘逸”“雄俊”“典雅”这一类的字眼形容文风，虽然，这也可以反映一定的文章特点，但偏重于文章的技巧方面，往往把文风说得很虚玄，有的甚至把文风看成是得之先天的东西，这就更是唯心主义的解释了。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文风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因为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是为了完成既定的革命任务而制定的。马列主义文风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毛主席之所以把文风提到党风的高度，就因为它是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表现形式。所以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文风不仅涉及文章写得好坏，而且关系到思想政治路线是否端正的重大问题。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都要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文风不正就会直接影响宣传的准确性，而舆论宣传上的偏差和错误又必然对革命实践造成危害。只有牢固地树立马列主义文风，才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贯彻，充分发挥革命舆论工作组织、动员群众的强大作用。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要想写好文章，就必须努力掌握马列主义文风。写文章固然要技巧，比如必须懂得一定的语法，掌握一定的

词汇，但首先要端正文风。有些同志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他们以为一篇文章只要有几个“精采”的句子，有一些漂亮的词汇就算是好文章了。他们不论在学习别人的文章或者自己动笔写文章时，不去研究整篇文章的思想内容和内在的逻辑关系，而只注意个别词句的修饰。写来写去，总是提高不大。

毛主席在谈到文风的重要性时指出：“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反对党八股》）当前，我们的革命事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了动员广大群众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华主席提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伟大号召，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口号。要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按照华主席的要求：“学习、学习、再学习。”树立和发扬马列主义文风，对推动全民族的学习运动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充分认识这个重要意义，让马列主义文风“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以推进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第一节 马列主义文风的产生和发展

一、马列主义文风产生的阶级根源和时代背景

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它是在彻底批判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文风的基础上形成的。随着工人阶级的日益壮大，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无产阶级要向全世界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要为“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而“大喊大叫”。（毛主席：《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

文的按语)地主、资产阶级老爷们的那一套反动腐朽的文风,是阻碍、窒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创立自己的文章风格。马克思、恩格斯等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带着一种崭新的文风大踏步地进入了舆论阵地,一扫为地主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们把持论坛时的沉闷风气,用生动活泼、鲜明有力的笔调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把哲学、政治经济学这些过去认为高深奥秘的学说直接交给了工人阶级。象《共产党宣言》等这样一些光辉著作,不仅在理论上第一次树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文风的第一座丰碑。列宁、斯大林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理论的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风,在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伟大实践中,为了批判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辛勤劳动,他们写下了大量的光辉著作。列宁是一个出色的宣传家和鼓动家,他说过:“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写作。”(《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在沙皇的牢狱里,在西伯利亚的流放中,在被迫侨居外国的时期,列宁不停地写作。在斗争最严峻的时刻,列宁的传单、小册子和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成了鼓舞工人阶级斗志的号角。这些伟大革命导师的著作不仅为我们留下了革命理论,也给我们留下了革命的文风。

在中国,新的文风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兴起的。当时作为封建文言和八股的对立面,出现了一种反映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新文风。这种文风从内容上是反对封建伦理纲常的旧道德,提倡科学民主的新精神;从形式上是反对死板僵化的老八股,提倡“明白如话”的白话文。这是“五四”运动一个极大的功绩,“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

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反对党八股》）可见，马列主义文风的形成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毛主席就创办刊物，宣传马列主义，以后又亲自领导了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通过这些极其丰富的革命实践，毛主席对“五四”运动时期新文风的积极因素给以马列主义的改造，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马列主义文风。毛主席的著作是马列主义文风的光辉典范。他为我们留下的雄文巨著不仅是引导我们继续革命的指路明灯，也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文风的宝库。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在创立中国马列主义文风方面也有着重要作用。他是毛主席所指的“党外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五四”运动时期，鲁迅是向旧传统猛烈冲击的勇士，但他那时还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以后，鲁迅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一生握笔战斗，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有他自己的独特风格，特别是他后期的文章，思想性战斗性很强，笔调也更加成熟，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学会了辩证法，从世界观上完成了由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鲁迅的著作也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文风的好教材。

二、马列主义文风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马列主义文风是在革命的实践中产生，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长期以来存在着无产阶级革命文风和资产阶级腐朽文风的斗争，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批判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反动理论的同时，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他们的恶劣文风的批判，这只要看一看马克思对拉萨尔，恩格斯对杜林，列宁对考茨基的论战就可以知道这一点，这是因为不扫荡资产阶级的腐朽文风，马列主义文风就得不到发扬。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投身国际工人运动的第一天起，就十分重视宣传舆论工作，把报纸看成是“最重要的阵地”（《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4年6月5日）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二十四小时内就夺了《新莱茵报》的权，马克思亲自掌握编辑部，撰写文章、修改稿件，向反动势力发动舆论进攻，恩格斯曾兴奋地回忆说：“在一八四九年春季，决战临近的时候，报纸的语调就变得一号比一号更猛烈和热情。”“没有一家德国的报纸——无论以前和以后——象《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马克思和〈新莱茵报〉》）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深刻地批判了杜林的恶劣文风，指出他违背基本的逻辑规律，搞同义反复；“把需要证明的论点，当成他用以论证的前提”，是一种“神喻式的空话”。恩格斯指出：杜林的思想“多么不适合于任何语言，而德语又是多么不适合于这些思想。”

列宁和斯大林在同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人物和第二国际，孟塞维克等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始终不断地批判他们的反动理论及其资产阶级文风。指出他们的文风是用以欺骗人民，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列宁对托洛茨基常用漂亮的词句掩盖其反革命面目时，特别指出：“发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词句很光辉很响亮，可是没有内容。”斯大林也指出：托洛茨基“把列宁主义看做

‘体力劳动中肌肉的感觉’。这岂不是又新鲜，又奇特，又深奥。……这些话都很漂亮，很象音乐，还可以说，甚至很雄壮。只是缺少一点‘小东西’：简单而又人人懂得的列宁主义定义。”（《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5、244页）

在中国的“五四”运动时期，文风之争也是一个重要的战场，鲁迅代表着新文风的积极方面，和甲寅派斗、和新月派斗，除了揭露这些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文艺的反动腐朽外，还着力批判了他们的老八股和洋八股，特别是和甲寅派的论战中，鲁迅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专门揭露那些所谓的古文大师们文理不通，乱用成语，东抄西摘，陈词滥调，如关于“每况愈下”的运用，“二桃杀三士”的引证，“此生或彼生”的解释等，弄得那些复古专家大出其丑。一九二四年，自称“诗哲”的徐志摩投稿于《语丝》杂志，宣扬他那谁也不懂的新月体文风，鲁迅立即写了《音乐？》一文痛加批驳，使他狼狈不堪，再也不敢向《语丝》投稿了。

在我党历史上，围绕文风的斗争也是十分激烈的。当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到处兜售党八股，装腔作势，以售其奸的时候，毛主席结合整风运动，连续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光辉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党风、学风、文风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刻地揭露了党八股的阶级本质和表现形式。把党八股的危害提到“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的高度，捍卫了马列主义文风的纯洁。不仅如此，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毛主席还接见报社编辑人员，亲自为报社撰写文章和社论。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更是经常对全党进行文风教育，指示各级党委第一、二把手要亲自写文章，要求中央委员们当“国

文教员”，“要注意帮助人家，把文章的作风改一改”（《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要求报刊的编辑同志“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凡是看到好的文章“没有党八股气”的，毛主席总是满腔热情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推荐。为发展马列主义文风，毛主席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当前在深揭猛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的流毒影响的同时，也必须对帮八股进行彻底清算。这是马列主义文风和党八股长期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为了彻底肃清帮八股的流毒，《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了《讨伐“帮八股”》，《从假字开刀整顿文风》等文章，其它报刊也纷纷著文列举帮八股的种种表现，加以分析批判，许多学校也明确提出用马列主义文风改革语文教学。这些对整顿文风都有着重要意义，目的是要象毛主席说过的那样：弄得“帮八股”这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我们要充分认识批判帮八股的重要意义，自觉地为树立和发扬马列主义文风而斗争。

第二节 马列主义文风的基本特征

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里提出要：“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主席更具体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

动性。”这三性就是马列主义文风的基本特征。

一、文章的准确性

1. 准确性是马列主义文风的基本要求。

任何文章都是宣传：不是宣传正确的东西，就是宣传错误的东西，而正确或错误的标准，不能靠主观臆想，必须受客观的检验。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整顿党的作风》）文章的准确性就是要如实地反映为客观实际证明了的真理。这是马列主义文风的基本要求。

在谈到文章的准确性时，毛主席指出：“事实要准确，道理要准确，引用马列主义原句要准确。”（《毛主席对大批判的指示》）事实是独立于人们主观之外的客观存在，它有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具体的发生发展的过程；道理是从具体事实中抽象出来并上升为理性认识的东西，它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的、内在的逻辑联系；引用马列主义原句也属于讲道理的范围，因为马列主义正是经过客观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可见文章的准确性就内容而言包括摆事实和讲道理两部分，从人类认识形成的过程看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要使文章具备准确性就必须遵守思维规律，做到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符合逻辑，所以毛主席又指出：“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逻辑问题。”（《工作方法六十条》）

客观事物错综复杂，包罗万象，“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同上）写文章要做到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符合逻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具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唯物论的

反映论，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要深入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丰富的材料，按照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分清事物的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普遍和特殊，成绩和缺点，先进和落后，从纷繁复杂的客观现象中抓住问题的实质，尽量做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力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

2. 准确性的关键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毛主席说：“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反对党八股》）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通过文章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方法。因为客观事物都存在着矛盾。对于写文章来说，矛盾也就是问题。“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反对党八股》）要解决提出的问题，还要用分析，即进一步分析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揭露事物的内部联系。有了分析，然后才能综合，指明矛盾的性质，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由此可见，文章的准确性首先就体现在作者是否能够准确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做到这一点，文章的准确性就有了基本的保证。

我们可以举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两篇文章说明作者是怎样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一开始就提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问题提得这样尖锐、严正，使读者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下“为什么呢？”并且急于从文章中去找寻答案；毛主席用“首要”这个词，非常准确地表述了问题的性质。“首要”既强调了“重要”，又突出了“首先”，也就是说，分清敌我的问题不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就无从谈起，党的一切政策、策略也都成了无的放矢。接下去，毛主席从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政治地位、经济状况，对革命的向背等方面进行了极为深刻的分析，指出他们在不同时期必然和可能采取的态度，最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最后的结论只有四句话，每句话基本上就是一个判断，把敌我友的营垒划分得清清楚楚。严密准确，不容置疑。这篇文章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紧紧地抓住了读者。随着对问题的精辟分析，读者原先可能产生的一切怀疑的想法，模糊的认识一个个迎刃而解。这就叫解决了问题。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指的是文章的内在联系，而不是写文章的顺序，不是说每篇文章必须以提问开始。“提出问题”的真正含义在于作者有意识地抓住现实生活中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作为自己论述的对象；“解决问题”也不是要求每篇文章的末尾必须提出几条具体措施，而在于作者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说明了道理，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比如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鲁迅并未以提问的方式开头，而是首先列出应当批判的反动观点：要推行费厄泼赖精神，就不能打落水狗。然后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

“总而言之，不过说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而已。”

这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表述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同样向读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对阶级敌人研究应该“宽恕”，“仁慈”，还是“穷追猛打”。读者在读了《解题》以后自然会联想：“到底应该不应该打落水狗”呢？针对这个问题，鲁迅从落水狗的种类，叭儿狗的伪善，不打落水狗的报应等正反几方面的分析中，得出了在阶级斗争中，不能“一味费厄”，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落水狗”除了痛打之外，别无他法，在文章的结尾，鲁迅写道：

“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这一段话也没有具体的方法和措施，但它进一步强调了结论。一方面从具体引向了一般，从几次革命的失败，秋瑾烈士的被害得出了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反改革者对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另一方面把打不打落水狗提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因而使立论非常谨严，作者在篇首提出的问题：到底该不该打落水狗，至此也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分析问题是关键。因为问题的提出要靠分析，问题的解决更要靠分析。就象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的：“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常

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

什么是分析呢？毛主席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分析方法，在许多文章里都对分析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主席号召我们：“要象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主席提出要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在谈到对毒草的批判时，毛主席特别强调“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毛主席多次批评过：“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而对于许多的好文章，毛主席又总是首先肯定作者善于分析，有说服力。

由于人们认识水平、表达能力不同，特别是分析能力的不同，文章的准确性也有程度上的区别。有的文章就事论事，也许是正确的，但因为没有深入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顾此失彼，强调了这一面，忽略了那一面，或者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有的文章虽然也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也进行了一些分析，但分析不深，说理不透，也会影响文章的准确性。

我们试读马、恩、列、斯、毛主席以及鲁迅的许多文章，首先给人的强烈感受就是那种不容置疑的论证。有的文章经过了百年以

上时间的考验，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除了因为它们揭示了客观真理而外，还取决于那些深刻精辟的分析。斯大林曾经称赞列宁的演说有一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一步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论列宁》）

下面我们举几篇毛主席的文章着重说明分析问题的重要。

第一篇是毛主席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所写的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为了说明党内的错误思想，毛主席举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七种。对每种错误思想又从它的根源、表现加以分析，然后明确提出几条切实可行的纠正方法；而在分析根源和表现中，又更具体地从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党的领导工作等几方面加以论述，指明这些错误思想之所以会在红军的队伍中存在不是偶然的。由于这篇文章抓住了当时带有倾向性的错误思想，对它的表现揭示得很充分，对产生的根源挖得很深刻，对纠正的办法又提得很具体，因而在红军战士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红军队伍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迅速清除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保证红军沿着毛主席的建军路线胜利前进。这篇文章是从各方面分析问题的典型。但应当注意的是这是会议的决议，所以条款分得较多、较细，为的便于贯彻。我们要学的是这种分析方法，不是说每篇文章必须分出若干条款。

第二篇是《新民主主义论》，在第十三节《四个时期》里，毛主席把二十年来的文化革命统一战线分为四个时期，从每个时期的主要标志，特点，革命和反革命斗争在文化上的反映进行分析，只用了三千字左右的篇幅就把二十年间文化革命统一战线的产生、发展、壮大以及今后的方向阐述得简明扼要，脉络清晰。这是按矛盾

发展的过程进行分析的典型。

第三篇文章是《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在论述“民族统一战线”时，毛主席写了这样一段：

“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

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

一个说，如果不够地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行动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就不能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如果不够地估计到日本反革命势力、中国反革命势力和中国革命势力这几方面的强点和弱点，就不会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就不会采取坚决的办法去打破关门主义；就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

一个则说，这些批评都是不对的。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那有猫儿不吃油，那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在这里，毛主席把两种对立的观点摆出来，用不着说更多的道理，读者就已经能得出孰正孰错的结论。这种对比分析的方法对于批驳谬误，阐明真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要想提高写作能力，增强文章的准确性和说服力，就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